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模式与空间演化 ——以张家界为例

麻学锋^{1,2}, 孙根年²

(1. 吉首大学商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2.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西安 710062)

摘要:界定了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概念, 借鉴“路径依赖”理论重新诠释旅游地产业成长路径, 提出具有普遍性SGGT模式, 以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为例, 具体分析了SGGT和空间演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发现: ①历史与现实是武陵源旅游生长点形成的基础, 需求与培育是旅游生长点萌发的关键因素, 创新与拓展是旅游生长点成长的保证, 蜕变促进了旅游生长点成为旅游产业增长极; ②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个旅游生长点, 通过“路径创造”, 实现了行政管辖权的统一, 后被列为世界遗产地, 成为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核心生长点; ③在旅游产业“集聚力”和世界遗产地管控的驱动下, 天门山成为张家界新的生长点; ④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生长点的形成, 是张家界旅游产业集聚和“路径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 也拓展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成长空间。本文有利于为旅游地政府和企业从旅游产业生长点视角理解旅游产业成长路径, 更为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关键词: 旅游地; 产业生长点; 路径依赖; SGGT模式; 空间演化; 张家界

DOI: 10.11821/dljy201310015

1 引言

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2009)中明确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1]。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了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这意味着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培育新的生长点, 即开拓新的、有发展潜力的领域, 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现代旅游业的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根据已有的旅游产业发展实践经验, 新的旅游产业生长点主要立足于两个方面: 一是对旅游产业发展事实的充分认知和评估; 二是对现实旅游发展问题的敏锐感应与未来需求相对准确的预测。对中国旅游研究的回顾和总结, 是旅游学界做的极有意义的工作, 目前已有学者对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旅游研究做出比较全面、认真的总结^[2,3]。国内外研究旅游产业成长的文献资料还很少见到^[4], 国内在成长模式^[5,6]、时空演变形式与机制^[7]、制度变迁^[8]、机理作用与动力机制^[9]、演进(化)路径^[4,6]、重要标志^[10]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戴斌等对都市旅游成长进行了分析^[11], 马丽君等对旅游成长进行了定量分析^[12], 麻学锋等探讨了旅游地成长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系^[13]。已有的研究成果大体存在一个共同的逻辑前提: 旅游业已经得到了较

收稿日期: 2013-04-12; 修订日期: 2013-07-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61024); 生态旅游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JDSTLY201209)

作者简介: 麻学锋(1970-), 男, 苗族, 湖南凤凰人,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旅游产业经济学研究。

E-mail: maxuefeng90@163.com

好发展。他们都侧重于分析旅游业发展过程,忽视了旅游业成长的起点及其发展过程。得益于已有成果的启发,考虑到拟讨论的问题,本文集中关注目前在旅游产业成长研究领域拓展上的相对缺失——旅游产业生长点。目前对此概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对其实证研究也不多见。本文拟对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概念进行探讨,并尝试借鉴演化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范式重新诠释旅游产业成长路径,分析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模式及空间演化与其动力机制。

2 旅游产业生长点概念与旅游产业成长路径

2.1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概念界定

生长是个生物学概念,本文据此将生长点理解为:与某一事物联系较紧密,由此事物生发出来的,有明显传承或依附关系的事物。如,XX理论生长点,XX产业生长点和空间生长点等。地理学上,生长点是在某段时间中相对其他区域增长最快的地段,它是新的空间核心的前身^[14]。这虽解释了生长点的含义,但对“点”却没有进一步的分析,结合“点—轴”系统中“点”的界定^[15],将生长点中的“点”界定为能促进事物生长的各级中心地,使“点”具备了“可大可小”的动态性特征。由于生长点是个相对概念,可以表现为体积、重量、位置、数量、速度及其具有传承或依附关系的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会产生位移轨迹,这种位移轨迹可体现其空间演化过程。结合旅游产业特点,本文将旅游产业生长点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人类社会以满足需要、谋求发展为目的,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发现和开发而生发出来的、在一定时间内依据一定的路径依赖成长的产业生长点,是旅游产业聚集(扩散)的基础和旅游产业形成的前身,更是旅游产业增长极形成的前提。

2.2 基于“路径依赖”的旅游产业成长路径分析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任何事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环境中遵循一定生长路径实现成长壮大的。旅游产业相对于成熟产业而言还是新兴产业,其成长路径十分值得探究。目前旅游界取得较为一致的旅游产业成长路径大致如下: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开发→市场需求拉动→基础设施完善配套→投资、技术与制度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但这个成长路径能否有效地解释不同类型区域的旅游产业成长过程还有待于进一步更多的实证支持。为此,尝试借鉴演化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范式,进一步诠释自然资源富集区的旅游产业成长路径。路径依赖最初用于分析技术轨道^[16-18],后被拓展,用于指小的、历史偶然的事件能够引起锁定在结构和发展路径的自增强机制与过程^[19]。Martin等在指出该概念错误的基础上,认为路径依赖和锁定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地方依赖的过程,因而需要地理解释^[20]。Martin等强调从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与结构条件、情景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认识、辨别区域特定的路径依赖、锁定和路径创造的各种具体机制,但他们更加强路径依赖和锁定的“地方依赖”性质;并进一步指出,路径依赖概念在地理中运用时,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创新,如地方路径依赖、区域路径创造、“正面”的锁定与“负面”的锁定、功能上的锁定等^[19]。对于旅游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区域而言,富集的旅游资源是其产业发展的“地方依赖”基础,因此,本文基于对旅游产业生长点和路径依赖的理解,根据旅游产业的特点,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如下旅游产业成长路径(图1):

旅游资源认知与筛选是进行旅游产业开发的基础,也是旅游产业成长路径和锁定的“地方依赖”。旅游资源是个动态概念,与人类需求相适应,对旅游资源的认知和开发是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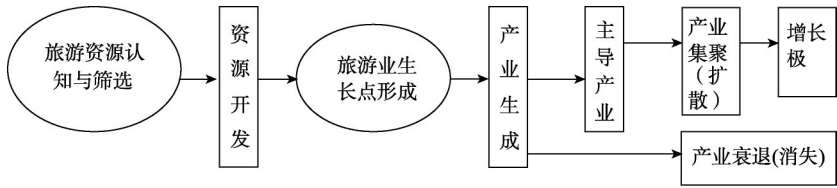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产业成长路径

Fig.1 The growth path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旅游业生长点形成的前提, 只有其成长壮大并生成旅游产业(成长不顺会导致产业衰退或消失), 并在其生成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市场力量和产业关联效应, 在既定区域内形成推动效应, 引发旅游产业集聚, 成长为区域主导产业, 才能最终形成区域性增长极, 达到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目的。

综上所述, 旅游产业生长点是旅游产业成长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 同时, 亦具有“路径依赖”。对旅游产业生长点形成和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 是旅游产业健康有序成长的有效指导基础。在具体的产业发展实践中, 微观上遵循“路径依赖”规律利用“正面”锁定应优先生长点的建设; 在宏观上要大胆进行“路径创造”破解“负面”锁定促进生长点向增长极转化, 使旅游产业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同时, 也有利于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根据旅游产业成长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 采取不同的策略。

3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模式

依据路径依赖的旅游产业成长路径分析, 结合旅游产业生长点的界定, 本文提出 Soil (土壤)—Germination (萌发)—Growth (成长)—Transmutation (蜕变) 分析方法, 即 SGGT 分析法。

3.1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土壤 (Soil): 历史与现实

与其他生物体一样, 旅游产业生长点需要拥有自己的土壤, 即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社会经济环境, 这也是旅游产业成长过程中难于绕开的“路径依赖”。从历史视角看,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旅游产业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后, 是旅游事业转型与延续的结果。从当时现实视角看, 中国拥有众多品味很高的旅游资源亟待开发, 同时, 通过发展旅游业亦能满足对外交往以提升国际形象和换取外汇的需要。旅游产业生长点的发育必须, 而且也只能根植于当时历史现实。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旅游产业的生长点根植于历史是基于对旅游本质的认识, 如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和古老建筑以及历史遗存, 都是极具旅游开发价值的资源, 皆是高品位的旅游产品; 同时, 这些资源通过人类对历史经验事实给予科学重构“服务”于现实, 满足人类旅游需求。当然, 历史文化资源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虽可对现实服务, 但不应当蜕化为对现实需求的盲从和屈从, 破坏其可持续性。现实本质上就是历史的延伸体, 作为历史发展结果的现实, 也会为人们重建历史打开更广阔的探索空间, 提供源源不断的启示和更准确的理解^[21]。

3.2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萌发(Germination): 需求与培育

旅游产业生长点由于具有生物体的属性, 需要合适的土壤作为前提, 也离不开外在环境的支持, 需求的存在和精心的培养是其萌发的保障。中国旅游产业的需求与培育从建国

以来历经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旅游产业生长点的萌发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国之初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旅游业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增进中国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是“政治接待型”^[22]。在这个阶段旅游产业生长点的萌发路径锁定于政治接待需要,对外展示和宣传功能是核心,产业性质被忽视,从属于事业接待。但在客观上培育了中国入境旅游产业的成长和管理经验,推介了中国旅游产品,培育了潜在客源市场。

改革开放到市场经济确立前。改革开放后,中国急需大量的外汇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1986年正式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基本方针是“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22]。这个方针指导旅游业发展的直接结果是,更多的旅游资源被发掘,更多的旅游产品被推出,一切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需求的是外汇,培育的是国外客源市场。旅游产业生长点体现于发掘并开发高品位旅游产品,并催生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和涉外酒店,旅游人才的培养也侧重于对外接待型人才。

市场经济时期。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一次在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确立,“十五大”后拉开了国有旅游企业的改革,同时地方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发展旅游业,在积极发展入境旅游的同时,开始推动国内旅游的发展,满足国内人民的旅游意愿。此时旅游产业生长点萌发于发展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并推进所有制改革,进行制度培育,为旅游产业生长点由萌发到成长提供有利条件。

3.3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成长(Growth): 创新与拓展

和任何新产业一样,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成长需要政府的培育,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经验证明了政府在旅游产业成长中的巨大作用。从投资经营到市场转型,政府在其成长过程中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包括制度创新)给予支持和扶植,顺利实现了旅游产业由“政治接待型”到“经济经营型”的转轨,这是突破计划体制下的旅游产业成长“路径锁定”,亦可理解为“路径创造”。市场体制确立后,旅游产业在自身生存需要和竞争压力下的利益需求推动,政府和业界结合“路径依赖”并不断进行“路径创造”,不断拓展自身产业链条,主动适应旅游市场发展的需要。

3.4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蜕变(Transmutation): 增长极形成

旅游产业生长点根植于其所处的区域,当旅游产业遵循“路径依赖锁定”在区域内出现多个同类生长点时,如果能通过旅游产业集聚力和有意识地实现“路径创造”,使其发展成为主导产业或者推动型企业,则创新能力、外部经济能力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于主导产业或推动型企业,就会形成区域性增长极,并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4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分析

中国目前自然遗产地旅游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国内各地利用世界遗产地发展旅游产业的热情,以期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为较好地解决中国各地利用世界自然遗产地在发展旅游产业过程中面临的开发与保护难题,总结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产业成长过程就成为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总结已成功利用世界自然遗产地进行旅游产业开发的旅游产业生长点形成规律,对于目前正在利用世界遗产地发展旅游产

业的区域,无疑具有指导意义。张家界旅游产业起步于武陵源,偶发于张家界国营林场多业经营需要,深入分析其生长点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张家界旅游产业成长的“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及其空间演化过程。

4.1 土壤分析

从微观视角看,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的出现,根植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经济基础。积穷积弱的人民生活状态、落后的区域经济水平和世界级旅游资源禀赋并存,是当时大庸县、桑植县与慈利县的历史与现实。张家界现代旅游启动之前,大庸县、桑植县与慈利县三县是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县,人们长期生活在极贫极苦之中。所以,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是当时各级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成为旅游产业生长点形成的原动力。从旅游资源禀赋看,“神、奇、秀、野”是对武陵源旅游资源特色最好的概括。同时,三县长期的相对封闭和多民族聚居,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这种旅游资源特色决定了旅游产业生长点只能“生于斯、长于斯”的路径依赖。根植于这样的土壤,即优质高品位的旅游资源和贫困的区域经济和人民生活,尽快利用资源发展旅游产业摆脱贫困是三县人民的共同选择。

从宏观视角看,发展旅游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后,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各地旅游业的快速成长,导致了国家对旅游产业的管理体制正在“由领导与经营集中统一的一体化格局向‘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政企分开’的多元化管理局转变”。旅游产业规模和产业业绩有比较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入境旅游接待设施有很大发展,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不高,在世界旅游业中所占的比例还很低^[7]。

4.2 萌发分析

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启动于当时国家“不提倡”、“不宣传”、“不组织”的“三不政策”背景下。对于当时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萌发而言,需求是基础,培育是支撑。

从旅游市场需求看,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复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居民具备了国内旅游的物质基础,国内旅游开始起步,为张家界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从经济发展需求看,当时的大庸县、桑植县与慈利县经济都处于贫困状态,具有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可开发的旅游资源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

从培育视角看,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依赖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的共同培育。尤其,在启动和建设阶段,各级政府官员的认同与推动是武陵源旅游产业生长点从萌发到破土而出的重要前提(表1)。

更有民间影响者,如吴冠中先生的《养在深闺人未识——张家界是一颗风景明珠》让湖南人民和政府官员认识了张家界;还有被编入中小学教材的《金鞭溪的青松》、《江总书记来到张家界》、《奇山异水张家界》、《索溪峪的“野”》等,为张家界旅游资源的对外推介和客源市场培育起到了推动作用。

概而言之,张家界森林公园、索溪峪和天子山各自独立相继开发旅游资源,其中政府和领导支持在旅游产业生长点的萌发上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行政分割紧密相关,这是由于在特定体制下旅游产业生长点萌发培育所具有的“路径锁定”,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旅游产业成长必须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投资。政府参与旅游开发的热情和对旅游发展的积极培育,是来自摆脱贫困的现实需求,最深层的核心动力是利益驱动。这种竞相开发的结果是形成了张家界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个旅游生长

表1 武陵源旅游生长点萌发的培育情况

Tab.1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point of germination and cultivation in Wulingyuan

历史时期	培育人	培育的生长点	培育内容	萌发情况	
启 动 阶 段 建 设 阶 段	1978	霍启明(湖南省林业厅长)	张家界国营林场	林场多业经营	为林场配置发电机,拨款20万元修路
	1979	万达(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	张家界国营林场	林场自然风光	对外开放,发展旅游
	1979	毛致用(湖南省委书记)	张家界国营林场	林场自然风光	修疗养院,对外开放,发展旅游
	1980	湖南省旅游局	张家界国营林场	提出开发建设张家界自然景区的措施和要求	发展自然风光旅游
	1980	林业部	张家界国营林场	提出建设国家森林公园	森林旅游得到开发
	1981	林业部、国家计委、湖南省林业厅	张家界国营林场	编制森林旅游计划书	建成国家森林公园
	1982	林业部专家组	张家界国营林场	张家界风景旅游资源	将张家界作为世界第一流的自然风景区推介
	1982	王治国(湖南省委副书记)	索溪峪	列入湖南省重点自然保护区	常德市政府36万元拨款,使唐家洲到叶家岗的公路顺利完工,并开通军地坪到旅游景点百丈峡和宝峰湖的简易公路
	1983	刘正(省长)	索溪峪	推动黄龙洞建设	落实316万元旅游开发建设资金
	1982	桑植县政府	天子山	为天子山景点命名	建成初步的旅游设施
1985	桑植县政府	天子山	编制《天子山风景区总体规划》	规划风景区面积113.44km ² ,5个景区50个景点	

资料来源:据夏赞才《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史研究》^[23]整理。

点,同时由于行政分割也埋下了未来发展过程中利益纠纷的隐患,也为武陵源的命名打下了基础。

4.3 成长分析

行政管辖权的分割导致了利益纠纷,也为创新提供了平台,更为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拓展提供了基础。张家界森林公园、索溪峪、天子山三个已经萌发的旅游景点分属于大庸县、桑植县和慈利县,其中大庸县和桑植县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慈利县受常德地区管辖。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地经过开发已成三足鼎立之势,亦奠定了武陵源风景区的雏形,但由于权属问题,为争夺利益,摩擦纠纷不断,引发冲突。虽然三个生长点分属于三个县不同地区管辖,但上一级行政管辖权为湖南省政府,这就为行政区划的调整提供了便利条件,更为“路径创造”提供了可操作性。三个生长点在地质、地貌和风景环境方面,又有机地构成了一个相互依托、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整体。1984年湖南省政府为解决三个景区的纠纷,决定将三个景区进行统一命名,经黄永玉命名,湖南省长办公会议通过,王震报告给邓小平同意,时任总书记胡耀邦题写“武陵源”,实现了管理创新。此后,“武陵源风景区”(1985年3月)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武陵源风景区”的命名解决了对外宣传的统一问题,但没有解决行政分割引发的利益纠纷。为彻底地解决利益纠纷,便

于统一开发, 1988年新的地级市大庸市宣告成立, 张家界森林公园、索溪峪、天子山隶属于新成立的武陵源区, 实现了从“三分”到“一统”。解决了三个生长点地理上相邻, 而旅游资源特色互补、游客不便、利益纠纷不断的问题, 也完成了景区的空间拓展。这是为解决纠纷而进行的地名创新和行政管理创新, 是张家界旅游产业成长中政府为解决“路径依赖和锁定”的“地方依赖”所进行的“路径创造”。此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卢卡斯博士和桑塞尔博士对武陵源资源的考察评价, 则为武陵源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3], 更为武陵源风景区的景区拓展和增长极形成创造前提条件。

4.4 蜕变分析

武陵源区的成立解决了张家界森林公园、索溪峪和天子山三个旅游景点的行政管辖权属问题, 为武陵源风景名胜最终形成提供了保障。1988年因“旅游立市”的大庸市, 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游客“进不来、出不去”的状况。枝柳铁路和张清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 张家界机场民航业务的开通等对解决游客“进得来、出得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次是游客接待基础设施问题, 当时的宾馆建设主要在锣鼓塌、卸甲峪和刘家拐三地。锣鼓塌在1991年前是景区内最重要的旅游宾馆集中地, 从金鞭岩饭店在1982年开业开始, 先后在锣鼓塌建成的宾馆达到了20533 m², 接待的床位数达到1498个(表2)。从投资主体来看, 这些宾馆的建设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和大型国企^[23]。

产业集聚是形成增长极的基础。在当时旅游产业出现了在景区内集聚的状况。受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黄牌”警告, 原来分散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和天子山景区范围内的旅游宾馆和其他设施先后被拆除, 搬离景区, 形成了景区游、市区住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源于《世界遗产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要求, 更是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依赖”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由于张家界落后的地方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贫困, 本地民间资本在旅游产业发展之初无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同时, 也受限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 外来民间资本无法顺利进入张家界旅游市场参与投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 张家界市政府大胆创新, 实现“路径创造”, 探索出“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社区参与”的经营模式, 突破旅游产业成长中初期的“路径依赖锁定”, 大力招商引资, 吸纳多种主体参与旅游开发。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开发的景点主要有: 黄石寨、金鞭溪、十里画廊、天子山、袁家界、袁家院子、杨家界等, 景区内部先后建成黄石寨、天子山和百龙天梯索道。受旅游产业规模效应和产业发展前景的吸引, 国内外大量资本参与了张家界旅游景区(点)和接待实施的建设。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外围集聚的卫星景点有茅岩河九天洞、龙王洞、土家风情园、江垭温泉、秀华山馆、紫霞观、军声画院等; 更有依托大量客流进行资源深度开发出来的魅力湘西文化广场、中国大鲵科技馆、黄龙洞哈利路亚音乐厅、天门狐仙等。2010年末, 张家界集聚在城区的二星级以上宾馆发展到50家, 其中五星级宾馆1家, 四星级宾馆7家, 三星级37家, 旅游直接从业人员已达34300人, 日接待能力在4万人左右; 旅行社66家、其中国际社24家, 拥有持证导游4500人。

1988年后, 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增长极的大庸市(张家界市)旅游产业真正开始了“旅游立市”的区域产业发展新格局。历经多年发展, 尤其是1992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后,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得到了快速发展, 引来了大批中外游客。

旅游集聚效应和“路径创造”促成了天门山景区的开发与发展。目前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与天门山双双成为国家5A级景区, 形成了区域内“双点”联动发展的双核格局。到2010年末, 拥有国家等级旅游区(点)数14个。其中, 4A级及以上旅游区(点)10个。

表2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辖区的宾馆建设(1982-1991)

Tab.2 Hotel construction of Zhangjiajie National Forest Park area from 1982 to 1991

名称	地址	建造面积(m ²)	床位数	修建时间	开业时间
金鞭岩饭店	锣鼓塌	2885	400	1980	1982
奇峰宾馆	锣鼓塌	700	48	1983	1984
翠楼宾馆	锣鼓塌	1812	68	1983	1984
广播招待所	锣鼓塌	1200	110	1984	1985
张家界宾馆	锣鼓塌	5144	480	1984	1986
怀化铁路宾馆	锣鼓塌	1061	124	1985	1986
邮电山庄	锣鼓塌	3000	80	1985	1986
栖凤山庄	锣鼓塌	4031	83	1985	1986
公安招待所	锣鼓塌	500	55	1986	1987
银苑山庄	锣鼓塌	200	50	1990	1991
法院招待所	卸甲峪	670	26	1984	1985
武警招待所	卸甲峪	544	48	1985	1986
煤炭疗养院	卸甲峪	10000	260	1984	1987
青岩山宾馆	卸甲峪	2500	150	1986	1987
湘电山庄	卸甲峪	7982	220	1984	1988
有色山庄	卸甲峪	2200	168	1986	1988
红十字会接待站	卸甲峪	3600	130	1987	1990
襄铁疗养院	卸甲峪	1365	85	1988	1990
荆门炼油厂休养所	卸甲峪	3610	120	1990	1991
武汉山庄	刘家拐	1032	50	1986	1987
公路接待站	刘家拐	1682	50	1985	1988
税务招待所	刘家拐	421	44	1987	1989
琵琶溪宾馆	刘家拐	18000	450	1986	1990
金鞭溪山庄	刘家拐	1600	60	1990	1991
合计		77026	3559		

资料来源: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历经20余年的发展,旅游产业已成为张家界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以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能较好地体现旅游业在张家界国民经济中主导产业地位的确立和演变过程(图2)。张家界旅游业占GDP的比重随着旅游人次的增加呈现出增长态势。旅游人次从1989年的39万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2404.82万人次,旅游业占GDP的比重从1989年的1.69%,提升到2006年高点62.24%,2010年为51.68%。可见,旅游业在张家界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性地位十分明显。由图2还可见,在2003年和2008年旅游业占GDP的比重突然下降,更进一步地说明了张家界经济发展路径被锁定在旅游产业上。

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中心的旅游产业生长点,凭借旅游产业成长的“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成功地完成了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并成为张家界产业发展增长极,旅游产业也成为张家界的主导产业。但张家界旅游产业成长仍受限于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开发的“路径依赖”,未能有效突破“路径依赖锁定”,更好地延伸旅游产业链。到目前为止,张家界每人每次人均消费还未能突破人民币7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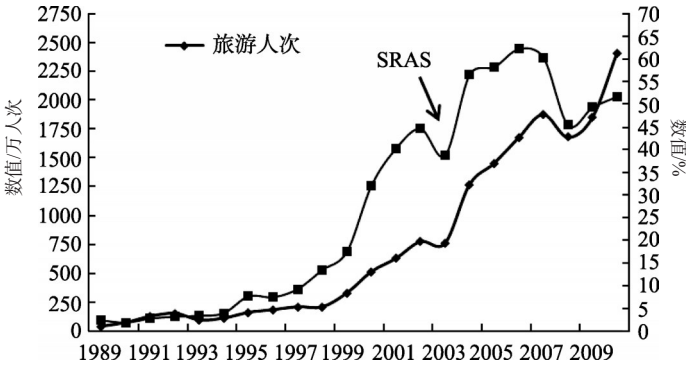


图2 张家界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989-2010)

Fig.2 Position of tourism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Zhangjiajie from 1989 to 2010

4.5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模式总结

基于对旅游产业生长点和路径依赖的理解，通过张家界的案例研究，分析了旅游产业成长路径中旅游产业生长点的形成模式：SGGT模式。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的土壤（S性），从微观上取决于当时积穷积弱的人民生活状态、落后的区域经济水平和世界级旅游资源禀赋并存，宏观上取决于国内当时旅游产业管理体制的变迁；旅游产业生长点的萌发（G性），得益于国内旅游的兴起、地方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和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的共同培育；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成长（G性），三个行政管辖权分割的生长点以“武陵源”实现了统一命名，通过“路径创造”完成了行政区划调整，为旅游产业生长点拓展提供了基础；旅游产业生长点的蜕变（T性），武陵源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蜕变为一个更大的生长点，在基础设施、接待设施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旅游产业集聚效应和“路径创造”带动了天门山旅游生长点的形成，最终形成了张家界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图3）。

5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其机制

5.1 武陵源旅游产业生长点的空间演化过程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地，其旅游产业生长点的空间演化经历了三足鼎立、“三分到一统”和“双点”联动发展三个阶段，呈现出单点—极化—双点的发展态势，这是由于张家界旅游产业集聚效应和“路径依赖锁定”的空间体现。在逐步演化过程中，随着各旅游要素逐渐增加和完善，新的旅游生长点不断形成，旅游节点不断完善，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范围也得到不断拓展。尤其是区划调整的完成，利益纠纷得到有效化解，管理模式创新，原来三个各自相对独立的生长点实现了统一，为旅游产业集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成为张家界旅游产业最重要的产业增长极，为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功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这种格局的形成使旅游流实现了由三个独立生长点分割流动向统一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各景点流动；同时，旅游流也由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向周边地区进行有序流动，旅游产业生长点的空间演化顺利实现了从散点无序向空间有序的方向优化，最终推动形成了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旅游生长点空间系统的形成，成就了武陵源和天门山两大旅游生长点联动发展的空间格局。

5.1.1 “三足鼎立”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在1980年至1988年6月以前。1980年湖南省旅游局组织联合考察组对旅游资源进行考察始，到1982年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诞生，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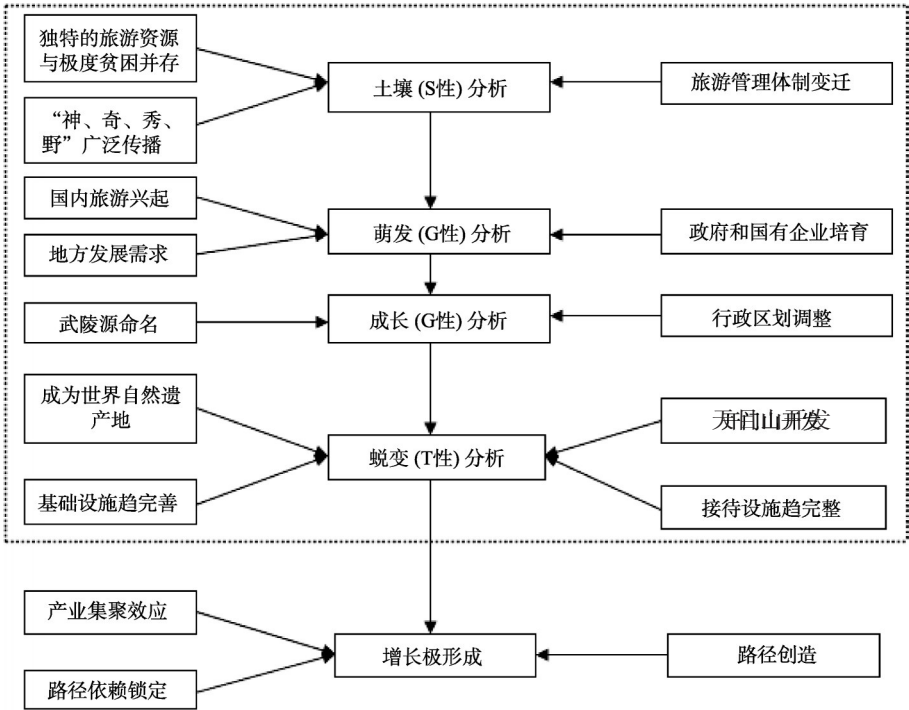


图3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分析

Fig.3 The SGGT analysis mode of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points in Zhangjiajie

然启动了张家界森林旅游开发，但张家界森林公园在行政管辖上属于当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大庸县，在管理上隶属于大庸县政府。张家界森林公园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投资带动了资源相似且临近的桑植县开发天子山，常德地区的慈利县竞相开发索溪峪，并且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由于行政分割，利益各不相让，旅游产业成长的“路径依赖”被割裂，“负面”锁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一格局持续到1988年6月的大庸市武陵源区成立前（图4）。从图4可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个旅游生长点地理上位置相邻，但分属于三个行政县管辖，由于旅游资源各具特色，呈现出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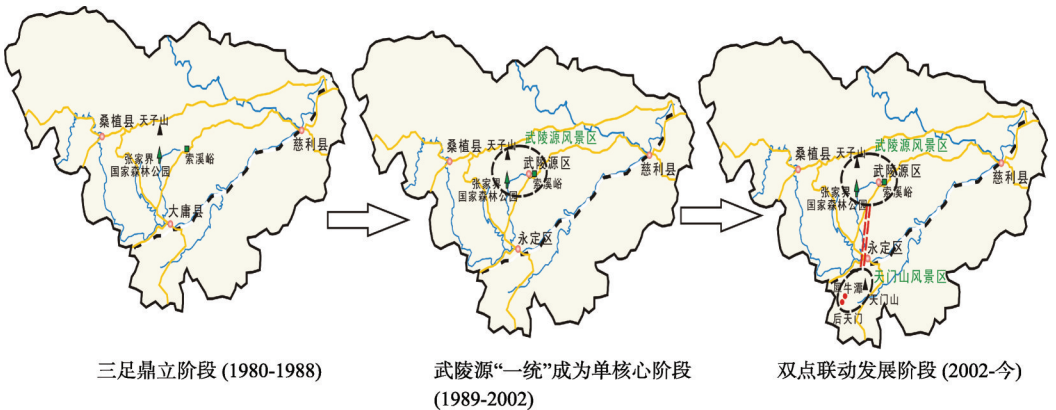


图4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空间演化过程

Fig.4 Spatial evolution of growing poi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Zhangjiajie

依托的成长格局。

5.1.2 武陵源“一统”阶段 1985年武陵源的命名,虽然结束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地对宣传的混乱局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分割的“路径依赖负面锁定”,三个生长点从各自利益出发,纷争不断,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破解“路径依赖负面锁定”导致的利益冲突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经国务院批准,1988年成立地级大庸市,下辖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和慈利县。将索溪峪、天子山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统一划归新成立的武陵源区,实现了管理上的统一,有效地解决了“路径依赖负面锁定”导致的问题,为旅游产业成长及其空间拓展提供了保障(图4);同时,三个分散的旅游生长点也实现了有机的统一,“路径依赖正面锁定”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生长点,成为带动张家界旅游发展的增长极。1992年底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张家界旅游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引来大批中外游客。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部在空间拓展上也相继开发了袁家界、杨家界等景点,旅游基础设施除完善景点间的游道外,也相继开发了黄石寨索道、天子山索道和白龙天梯,极大地拓展和方便了游客的观光空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有效“一统”,一方面拓展了游客的旅游空间,另一方面也方便了游客的观光选择,自增强效应带来了大量客流和旅游收入。1990年武陵源接待游客72万人次,到2011年达到1621.11万人次;旅游收入从1990年的2490万元提高2011年的65.79亿元,其中门票收入就达到12.08亿元。

5.1.3 “双点”联动发展阶段 随着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游客增多,大量游客的涌入带来了容量承载饱和的问题,问题实质是“路径依赖正面锁定”的同时伴随了“负面锁定”。同时,旅游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利用已有的旅游节点,积极开发新的旅游景区(点)分散游客,扩大规模效应,成为地方政府和业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99年的飞机“穿越天门”营销事件,客观上让张家界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天门山打下了良好的开发和营销基础。

天门山旅游开发始于2001年,2008年顺利通过创建4A景区省级初评,2011年获得5A级景区资格。因拥有“天门洞”、“盘山公路”、“观光索道”、“鬼谷栈道”、“天门山寺”等自然和人文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成为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新名片,更是张家界旅游产业成长的新生长点。依托天门山推出的大型山水实景剧《新刘海砍樵》为张家界旅游增添了新的文化要素,实现了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丰富了张家界旅游内涵。

武陵源与天门山两个旅游生长点双双成为国家5A级景区,利用已有旅游节点成功实现了“双点”联动发展,成为带动张家界旅游产业成长的双增长极(图4)。天门山之所以能成为另一个增长极是有内在因素的,其中,张家界旅游开发的集聚效应、张家界形象提升、天门山本身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的愿望、灵活的招商引资政策和有效的营销策略等是主要原因,也是张家界旅游产业成长中“路径依赖”的必然选择。从成长过程来看,天门山成为A级景区的时间历经10年,大大短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这得益于前述因素的综合作用,尤其是旅游产业成长“路径创造”探索出的管理模式创新和灵活的招商引资政策作用明显。在空间上,分属于武陵源区和永定区,为游客来张家界提供了更多游览体验的选择空间。

5.2 武陵源旅游产业生长点的空间演化机制分析

旅游生长点的区域间扩散从地理尺度上讲是“集聚力”作用的结果,也是张家界旅游产业成长“路径依赖”客观选择的结果。在旅游生长点空间演化的不同阶段,集聚力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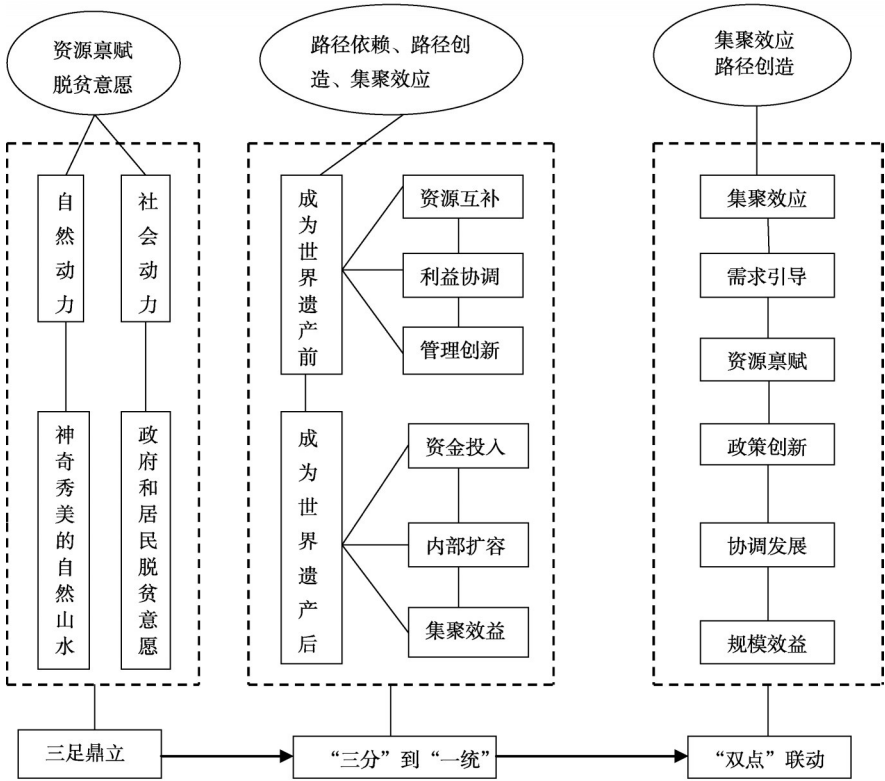


图5 旅游生长点空间演化动力机制图

Fig.5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spatial evolution of growth point in tourism industry

生的作用力度并不完全相同，但推动其每个阶段演化的影响因子却存在着交互递进的关系。在武陵源三足鼎立阶段初始的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禀赋及地方政府和人民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在“三分到一统”阶段，成为世界遗产地前，旅游资源禀赋的互补性、利益协调和管理体制创新成为这一阶段的动力；实现了“统一”并列入世界遗产地后，其成为一个新的增长极，大量资金投入、扩大内部容量和争取集聚效益成为相当长时期的核心动力。在“两点”联动阶段，集聚效应、需求引导、资源禀赋、政策创新、协调发展和追求规模效益成为这一阶段空间演化的主导力量。结合前文SGGT分析，可将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空间演化机制绘制图5所示。

6 结论与讨论

(1) 旅游产业生长点是旅游产业成长承上启下的关键，通过对张家界旅游生长点的SGGT分析，可以发现：历史与现实是武陵源最初三个旅游生长点形成的基础，需求与培育是其萌发的关键因素，创新与拓展是其成长的保证，蜕变则促进其成为旅游产业增长极。

(2) 张家界旅游生长点的空间演化是各动力因素向其集聚，不断拓展新的生长点形成新的空间结构的过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个旅游生长点被统一命名为武陵源，通过“路径创造”完成了行政区划调整，后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成长为张家界市旅游产业的核心生长点。在其产业集聚动力和世界遗产地管控的驱动下，武陵源的

旅游产业集聚导致空间扩展的同时, 作为区域旅游业的生长极, 其集聚效应和“路径创造”促成了天门山成为新的旅游产业生长点。武陵源和天门山这两个生长点的形成, 拓展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成长空间。

本文有利于为旅游地政府和企业从旅游产业生长点视角理解旅游产业成长路径, 更可为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本文采用质性分析方法, 构建了武陵源旅游生长点的SGGT模式, 但其典型性和代表性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同时, 在对旅游产业生长点空间演化过程及其机制分析时缺乏对旅游节点演化的进一步分析, 这是重要的研究命题,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成长过程既是景区空间扩展的过程, 亦是旅游产业成长“路径依赖锁定”的“地方依赖”的过程, 这也是今后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任务。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 国发[2009第41号]. 2009-12-01.
- [2]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旅游研究30年专家评论.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9.
- [3]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旅游研究30年.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9.
- [4] 王兆峰, 杨琴. 技术创新与进步对区域旅游产业成长的演化路径分析. 科技管理研究, 2011, (6): 132-136.
- [5] 许春晓. 欠发达资源丰富农村旅游业成长模式探讨. 人文地理, 1995, 10(12): 69-72.
- [6] 马秋芳, 孙根年. 基于旅游本底线法(TBCM) 的旅游业成长研究: 以桂林入境旅游为例. 经济地理, 2009, 29(8): 1402-1408.
- [7] 秦学, 邹春洋. 区域旅游业时空演变形式与机制探析, 学术交流, 2004, 128(11): 83-88.
- [8] 贾生华, 邹爱其. 制度变迁与中国旅游产业的成长阶段和发展对策. 旅游学刊, 2002, 17(4): 19-22.
- [9] 王兆峰, 杨琴. 技术创新与进步对区域旅游产业成长机理作用与动力机制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 2010, (2): 120-124.
- [10] 阎锋. 旅游产业成长阶段的重要标志: 生态旅游的兴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 97(3): 1-6.
- [11] 课题组. 论艺术园区的功能演化与都市旅游产业成长: 以北京三大艺术园区为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 2007, 147(7): 28-36.
- [12] 马丽君, 孙根年, 王洁洁, 等. 基于本底趋势线理论的3个遗产地旅游成长多周期分析. 山地学报, 2010, 28(4): 492-499.
- [13] 麻学锋, 孙根年, 马丽君. 旅游地成长与产业结构演变关系研究: 以张家界为例. 地理研究, 2012, 31(2): 245- 256.
- [14] 段进. 城市空间发展论.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 [15] 陆大道. 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5.
- [16] Dvid P.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1985, 75: 332-337.
- [17] Arthur W B. On competing technogies and historical events small events: The dynamics of chioic under increasing returns. Working Paper WP-83-90. International Institu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IIASA), Vienna, 1983.
- [18] 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 116-131.
- [19] 苗长虹, 魏也华, 吕拉昌. 新经济地理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20] Martin R, Sunley P.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4): 1395-1437.
- [21] 戴一峰. 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生长点.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 96-102.
- [22] 麻学锋. 旅游产业转型的理性构建与自发演进. 经济问题, 2009, (2): 124-126.
- [23] 夏赞才. 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史研究.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SGGT mode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growth point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Taking Zhangjiajie as an example

MA Xuefeng^{1,2}, SUN Gennian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Hunan,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fined the concept of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point and reinterpreted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path by applying the "path dependence" theory. With the example of Zhangjiajie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point, it put forward a universal SGGT analysis mode and researched its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 and dynamic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ed: (1)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economic environment was a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Zhangjiajie tourism growth point; demand and cultivation was the key factor of tourism growth point germin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 the guarantee of tourism growth point while the tourism growth point was promoted to be growth pole by disintegration; (2) the three tourism growth points—Zhangjiajie National Forest Park, Tianzi Mountain and Suoxiyu—became the core growth points after they realized unific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in Zhangjiajie scenic spot by path creation and listed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3) driven by the generating power of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point and world heritage site management, Tianmen Mountain becomes a new growth point with its high quality tourism resources; (4) the two growth points of Wulingyuan scenic spot and Tianmen Mountain were formed as a result of joint action by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path creation in Zhangjiajie. The results provide a great benefit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underst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point and further offer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Key words: tourism destination; growth point of the industry; path dependence; SGGT analysis mode; spatial evolution; Zhangjiajie